

承襲或轉化？——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菱格乳丁紋簋 的區域發展

■ 鐘雅薰

菱格乳丁紋簋，得名於腹部連續性幾何紋飾，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間。本文欲藉由此時期數件具有代表性的菱格乳丁紋簋，討論安陽殷墟、陝西關中地區與成都平原在青銅文化上的關聯，是承襲或轉化？見微知著，微小的紋飾即可推及背後的銅器設計概念及鑄造技術，甚者，或可揭開三地青銅文化之間交流的一角。

前言

菱格乳丁紋簋，名稱取自器腹主紋飾。此種富特徵性的紋飾是由連續性的菱格紋組成，每格內飾一突起乳丁紋。（表1）而在典型的例子中，乳丁紋四周會再填入雷紋，因此亦有乳丁雷紋之稱。

菱格乳丁紋簋盛行時間大致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間（約西元前十二世紀～西元前十世紀初）。其分佈的現象也值得注意，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陽及陝西關中地區。此外，在山西、河北等多處均有零星出土。但最吸引引人注目的是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一件金沙遺址群出土的菱格乳丁紋簋（圖1，以下簡稱〈金沙簋〉），為成都平原商周考古發現中首例的銅簋。¹〈金沙簋〉腹部的菱格乳丁紋具小而尖的乳丁紋，此特徵亦多見於關中地區的菱格乳丁紋簋（圖2），但其他的特徵則有鮮明的地方特點。

安陽殷墟、關中地區與成都平原各自是商、周與蜀三個群體的分佈地，亦代表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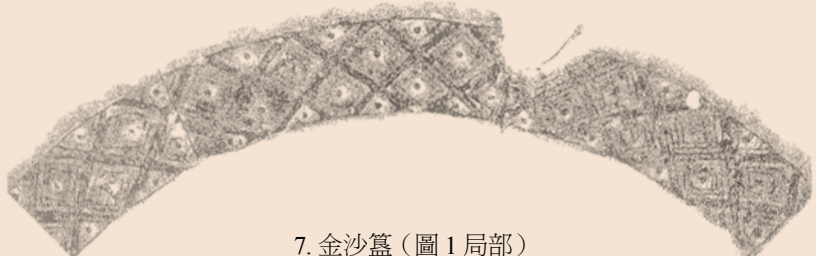
期至西周早期之間三個重要的青銅器出土地。以菱格乳丁紋簋為個案，是觀察三地青銅文化關係理想的切入點。安陽、關中及成都平原所出的菱格乳丁紋簋材料，豐富性差異很大。殷墟不只出土例證多，反映生產或使用制度等相關材料也豐富。關中也大量發現，但生產遺址等相關材料較缺乏。而金沙遺址所出的簋更是目前首例。然而，見微知著，微小的紋飾即可推及背後的銅器設計概念及鑄造技術。本文欲藉由數件代表性的無耳菱格乳丁紋簋，討論三地在青銅器製造方面有何的關係，是承襲或轉化？藉此揭開三地青銅文化交流的一角。

菱格乳丁紋簋的早期發展

銅簋始見於商中期盤龍城遺址，以無耳簋為較早的形制，有耳簋稍晚出現。但此時期發現尚屬零星，直到商晚期才普遍出現，並逐步納入禮容器組合的定制。從銅簋的發展史來看，菱格乳丁紋簋出現於商晚期，正

表一 立體獸頭與菱格乳丁紋的局部比較

作者整理

<p>安陽殷墟</p>	 <p>1. 正侯簋 (圖 4 局部)</p>	 <p>2. 寧簋 (圖 5 局部)</p>
<p>關中</p>	 <p>3. 共父乙簋 (圖 8 局部)</p>	 <p>4. 山簋 (圖 11 局部)</p>
	 <p>5. 院藏菱格乳丁紋簋 (圖 2 局部)</p>	 <p>6. 寶雞石鼓山 2 號墓 簋 (圖 12 局部)</p>
<p>成都平原</p>	 <p>7. 金沙簋 (圖 1 局部)</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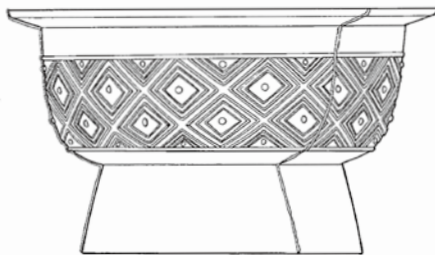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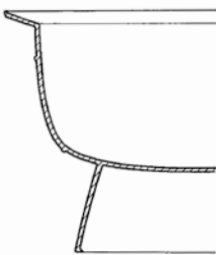


圖 1 西周早、中期 菱格乳丁紋簋 成都金沙青羊興建地點出土 成都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劉祥宇、周志清、王占魁，〈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銅簋〉，《文物》，2018年9期，頁33、34。



圖2 | 商末至西周早期 菱格乳丁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5



圖3 | 商中期 雲雷乳丁紋雙耳簋 陝西城固龍頭鎮出土 取自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圖版72。

是在銅簋興盛之際出現。

不過，在商晚期之前已見菱格乳丁紋簋發展的端倪。乳丁紋和雷紋皆是商早期青銅器上常見的紋飾，但是彼此獨立。真正將菱格、乳丁紋與雷紋三種紋飾單元組合在一起，目前所見最早的例子是陝西城固出土的〈雲雷乳丁紋雙耳簋〉，年代為商中期晚段。（圖3）²紋

飾以S形雷紋兩組構成一個四方形，四方形四周有菱格框一周，一行圓餅狀乳丁紋位於每個四方形的交界處，其餘空白處則有C形雷紋以乳丁紋為交叉點呈「X」形排列。（見圖3右）儘管與人們熟知的菱格乳丁紋「排列」不同，但已具備菱格乳丁紋所有的要素：菱格、雷紋及乳丁紋。

有個特徵值得注意：C形雷紋延伸至乳丁四周形成了四個小鉤。此這特徵亦見於後來的菱格乳丁紋，多位於紋飾帶上下緣。此處因空間限制，菱格被截去一半，變成三角形，內多見兩個小鉤，可能是用來示意被截去的紋飾。小鉤顯示城固雙耳簋的簋腹紋飾可能代表菱格乳丁紋未定型前的一種樣式。

安陽殷墟：確立菱格乳丁紋簋的基本形式

典型的菱格乳丁紋簋出現於商晚期。商晚期的發現中，河南安陽不僅出土數量多，亦出土生產證據陶範。河南安陽為商人都城殷墟之所在，為當時銅器的生產及使用中心。安陽殷墟出土的菱格乳丁紋簋參考地層關係、共伴的陶器或其他器類的訂年，呈現出清晰的發展序列。採用以大量陶器建立的一到四期分期尺標，殷墟的菱格乳丁紋簋盛行於殷墟二期至四期。亦可能延續到西周時期，孝民屯鑄銅遺址相關陶範的研究顯示，簋等銅器的生產可能持續至周滅商後。³以下選出代表性的菱格乳丁紋簋，勾勒出其發展過程。

菱格乳丁紋簋始見於殷墟二期早段，並快速興盛。至殷墟二期晚段，婦好墓出土五件簋中，有兩件為菱格乳丁紋簋。⁴小屯18號墓出土的〈正侯簋〉充分表現出菱格乳丁紋簋作為殷墟二期新潮樣式的情況。（圖4）簋呈束頸鼓腹，是新出現的圈足簋器形，後也成為殷墟數量最多的器形。此簋通體佈滿紋飾，形成「滿裝」的裝飾方式。共有頸部上方、頸、腹及圈足四條紋飾帶。頸部「三層花」效果的浮凸鳥紋飾帶和立體的小獸頭，加上腹部圓餅式乳丁紋與細密的雷紋及菱格構成的菱格乳丁紋（表1-1、1-2），形成多



圖4 商晚期（殷墟二期）正侯簋 河南安陽小屯18號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2·商》，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85。

層次的紋飾特徵，充分展現成熟的殷墟二期銅器風格。

為滿足當時繁複且多層次的紋飾，研究指出銅器鑄造在殷墟二期以降普遍出現複雜化的分範方式。⁵無耳圈足簋亦有分範數增多的現象。殷墟二期之前，無耳圈足簋採用外範縱向三分的作法。上節所提的城固雙耳簋即是如此，該簋耳是後鑄接於器身。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時，三個小獸頭處亦增設分範處，使之成為縱向六分。孝民屯鑄銅遺址發現一簋外範，證實獸頭處正好是範扣合處，扣合處有榫卯的設計。⁶獸頭位置為一個空腔，獸頭的範再嵌上去，顯示複合範的使用。〈正侯簋〉應當採用了新興的六分範方式。可以說，在殷墟二期，簋作為禮器的重要性及需求提升之際，採用新興紋飾和新分範法的菱格乳丁紋簋能夠充分展現這一轉折，在簋的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殷墟二期以後的菱格乳丁紋簋可區分出兩種風格：一是延續二期的傳統，趨簡化；



圖5 商晚期（殷墟2期）寧簋 河南安陽范家庄4號墓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圖76，頁178。



圖6 商晚期（殷墟3期）菱格乳丁紋簋出土 河南安陽大司空村51號墓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1958年春河南安陽市大司空村殷版代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10期，圖版2-3。

另一種則是發展出更為誇張的風格。前種風格以殷墟三期大司空村51號墓簋為代表。（圖6）整體紋飾布局由器頸、腹及圈足三條紋飾帶構成，此布局亦承自殷墟二期。（圖5）事實上，上述〈正侯簋〉的四條紋飾帶布局，二期以後趨少，三條紋飾帶的布局才是主要延續下去的裝飾樣式。

第二種風格的菱格乳丁紋簋，出現的時間稍晚，目前發現的數量較少。以殷墟四期新安莊225號墓〈犬簋〉（圖7）為代表。全器裝飾亦由三條紋飾帶組成。器形方面，折沿較寬，腹較淺且近底處內收，加上圈足起台頗高，搭配佈滿腹部尖凸的錐狀乳丁，使全器折角分明，風格上呈現鋒利感。⁷ 孝民屯鑄銅遺址在殷墟四期或稍晚的灰坑裡也發現長尖乳丁紋的簋範。⁸

綜觀殷墟出土眾多的菱格乳丁紋簋，儘管器形隨時間有所演變，且裝飾的紋樣主題不盡相同，但根本上遵守一致的設計概念：採取頸、腹、圈足三條紋飾帶的紋飾布局，並配合縱向六分外範的鑄造特徵。此種菱格乳丁紋簋的形式奠定於殷墟二期，並成為流傳最廣



圖7 商晚期（殷墟4期）犬簋 河南安陽新安庄225號墓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圖229，頁414。

的形式，後文討論的關中地區菱格乳丁紋簋的基本形式不脫於此，顯示兩地關係的密切。

關中：對殷墟菱格乳丁簋的承襲

陝西關中地區位於殷墟以西的渭河流域，是周的發祥地，也是周滅商後定都之處。豐富多樣的考古遺存表明，商時期已有多個擁有不同物質文化的群體居住在此，不同群體

各自與商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商代早期至晚期風格的銅器都曾在此地出土。簋是特別常見的類型，據統計，關中出土商時期簋的數量與殷墟幾乎一樣多。⁹ 菱格乳丁紋簋是當中盛行的種類，可細分不同類別。以下嘗試以乳丁紋的特徵將關中地區簋區分為三類，討論各自的異同。

一、圓餅狀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關中除有裝飾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簋這類與殷墟差異較大的簋之外，也出現一些與殷墟基本一致的例子，例如渭南南堡所出的〈共父乙簋〉。（圖8）簋年代參考器形大致與殷墟三期同時或略早。¹⁰ 〈共父乙簋〉的整體紋飾布局與上節討論殷墟二期以來發展成熟的菱格乳丁紋簋一致，分成口沿下、器腹與圈足三組紋飾帶。口沿下的浮凸鳥首龍身紋上飾有陰刻紋路，並襯以雲雷紋的地紋，為「三層花」風格。浮雕的獸首刻劃精細，獸角上亦有像鱗片紋路。此種獸角的刻畫，可追溯自商中期。（圖9）器腹菱格乳丁紋亦是殷墟典型的圓餅狀乳丁，格內雷紋規整，每格填入雷紋數目大致維持在六個。（表1-3）



圖8 商晚期 共父乙簋 陝西渭南南堡墓出土 取自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渭南、銅川、商洛、漢中、安康、延安》，冊15，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圖版1669。



圖9 商中期 獸面紋牛首尊 河南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1·夏商》，冊1，圖106。

此簋製作精細，細節亦顯示對殷墟簋的設計與製造技術無比的掌握。此外，簋銘是族徽與日名，出土的墓葬有殉人的現象，與商文化葬俗一致。渭南位於關中東部，一般認為是商文化浸潤較深的地區。此簋可代表關中地區所見典型的殷墟風格簋。

二、粗壯高凸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岐山賀家1號墓出土的〈山簋〉（圖10），製作從菱格乳丁紋細部特徵來看，乳丁紋四周的雷紋略顯不規整。每菱格內圍繞的雷紋數量不一定，且雷紋有大有小。（表1-4）此件的乳丁粗壯尖凸，過去多認為是在商式簋樣式上局部的改造，具有關中的地方特色。¹¹ 但如上節所述，孝民屯鑄銅作坊殷墟四期或稍晚的灰坑中也發現長尖乳丁紋的簋範，當是承襲殷墟風格。頸部的菱格紋及圈足條帶狀獸面紋亦描繪精準，與殷墟三、四



圖 10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山簋 陝西岐山賀家1號墓出土 取自曹璋，《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1229。



圖 11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戈簋 陝西銅川紅土出土 取自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渭南、銅川、商洛、漢中、安康、延安》，冊15，圖版1752。

期所見一致。從器形來看，〈山簋〉年代約是殷墟三期，但考慮尖乳丁形態的簋在殷墟出較晚，或許晚至殷墟四期。整體來看，這類具有粗凸乳丁紋簋與殷墟的例子同大於異。

其他的例子，如銅川紅土出土的〈戈簋〉（圖 11），亦是乳丁粗壯凸出；如武功縣滹沱〈覃簋〉與殷墟四期〈犬簋〉（見圖 7）近似。銅川與上述的南堡同屬關中東部，是商文化浸潤較深的地區。賀家位於關西西部周原，且 1 號墓形式為帶壁龕墓，罕見與商文化墓葬形制，學者將其歸為劉家文化的特徵，屬於羌系文化。¹² 武功位於漆水中下游是先周文化最集中的區域。就此來看，粗尖乳丁紋簋在關中分佈頗廣，由不同考古文化屬性的人群所有。從數量來看，這類粗長乳丁紋簋確實是關中出土為多，或許反映關中有選擇性地接收殷墟銅器文化再加以發揚光大。

三、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關中發現的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已不下五十件。此類在關中的乳丁紋簋中，出現年代相對較晚。參考出土墓葬的訂年，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的年代多集中於商末至西周早期，如：灃毛 1 號墓被歸於劉家文化第五期，絕對年代接近商末周初之際，石鼓山墓葬年代為西周初年。

儘管數量不少，但器形與紋飾的變化相對單一。皆作腹壁較直的盆式簋，頸部或圈足主要以折身夔龍紋裝飾。尖乳丁紋短小，僅略浮出表面，而頸部、圈足的獸面紋不見浮雕，裝飾趨平面，且地紋的雲雷紋描繪粗疏，導致主、地紋的層次不清。此種平面的紋飾在外範上直接施加紋飾即可。種種特徵反映鑄造上一定簡便化。

此外，從紋飾也可看出不規範的現象。有些立體小獸首僅簡單勾勒出雙眼及雙角（見圖 2、表 1-5），有些例子甚至五官全失。（圖 12、表 1-6）菱格乳丁紋中的雷紋，有些線條斷斷續續，有些轉折處改為兩條線交叉的現



圖 12 西周早期 菱格乳丁紋簋 陝西寶雞石鼓山2號墓出土取自上海博物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80。

象。石鼓山2號墓簋的菱格乳丁紋更為簡化，極似多層菱形套疊，僅在局部的轉折看出雷紋的味道。（表1-6）上節賀家出土的〈山簋〉（見表1-4）也有不規範的現象，但此處製作者基本不在意菱格紋內的雷紋表現。

儘管紋飾施作呈現與殷墟乳丁紋簋有所差異，但紋飾設計與鑄造方法仍承襲殷墟的傳統，還是採三條紋飾帶的佈局及縱向六分的鑄型。本院所藏的小尖乳丁式菱格乳丁紋簋六條範線清晰可見。（見圖2）

綜合上述三類乳丁紋簋的分析，關中地區的製造者應當是熟知殷墟紋飾設計傳統與製造技術，而施作不規範與對尖乳丁的偏好反映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整體來看，關中菱格乳丁紋簋主要表現出對殷墟銅器傳統的承襲。至於關中這三類菱格乳丁紋簋的品質差異，是反映地方生產與商中心生產的差異？或是反映關中存在兩種不同的鑄造系統？近年來，關中地區已陸續出土西周之前的鑄銅

相關的遺存，顯示商代晚期的關中具有自己的鑄銅業。¹³但商代關中鑄銅業的實際內涵及此區域內部差異，有待未來更多的材料解答。

成都平原：對關中菱格乳丁紋簋的轉化

成都平原位商周時期的文化自成一格，代表性考古文化為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橋文化，被認為是屬於早期蜀文化。成都平原的青銅器具有鮮明的特色。〈眼形器〉採取錘鍛且採以墨繪方式裝飾（圖13），大異於商周文化銅器的製造及裝飾傳統。簋罕見於當地，卻是殷墟、關中地區重要的銅禮器，故弄清〈金沙簋〉的年代與背景，對理解成都平原與別的區域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金沙簋〉出自金沙遺址的十二橋文化時期。目前該地點的正式報告尚未發表，而簡報僅披露部份共存陶器的訊息。由於地層中未見新一村文化的陶器，得以推斷年代不晚於西周中期，提供簋形器棄毀年代的根據。

〈金沙簋〉腹部的乳丁紋小而尖，此種特徵的簋在商末到西周早期的關中亦多有發現，但其器形有特點，腹特別淺，口徑與腹深比值僅0.3，呈寬扁狀。同時，器腹近底處急折內收，加上寬折沿，使全器折角分明。相較之下，關中石鼓山2號墓斜直腹簋比值為0.46，且近底處作圓曲內收。雖然關中地區另有一類下腹急內折、內收不圓曲的簋，但腹偏深，如關中周原美陽簋的口沿與腹深比值為0.5，與〈金沙簋〉器形差異較大。

紋飾設計上亦呈現當地特色。〈金沙簋〉僅有腹部裝飾紋樣，未見三條紋飾帶的佈局。更關鍵的差異是器身的菱格乳丁紋是以陽線的「重菱紋」加上乳丁紋組成。重菱紋亦見於



圖 13 商晚至西周早期 眼形器 成都金沙遺址梅苑地點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現輝煌的古蜀王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二版，頁38。

當地的陶器上（圖 14），十二橋紋化早期即有。前述關中石鼓山 2 號墓盆式簋的菱格表現乍看與這件相似，但局部仍可以看到線條交叉的情況（表 1-6），是雷紋極簡化的結果。兩者是不同的設計概念。

值得注意，殷墟及關中的銅器紋飾也有所謂的「重菱紋」，但與〈金沙簋〉所見的「重菱紋」是不同的紋飾。前者的重菱紋基本上都是由數個組合，形成一個「重菱紋多邊體」。有學者認為此種「重菱紋多邊體」是在描繪蠟子紋。¹⁴ 上節提及的關中賀家〈山

簋〉，其頸部的紋飾帶即是這種「重菱紋多邊體」。（見表 1-4）〈山簋〉頸部的「重菱紋多邊體」與腹部「雷紋」構成的菱格乳丁紋並置，顯示兩種紋飾區分是很明確。

再者，〈金沙簋〉在鑄造上與安陽殷墟和陝西關中地區的例子有所差異。〈金沙簋〉的鑄型採用了最基本縱向三分外範的方式。相較之下，殷墟與關中的例子多是六分外範。僅有素面或簡單紋飾採取三分範法。此外，〈金沙簋〉紅銅的成分也罕見於同時期的殷墟及關中。上述關中禮毛 1 號墓出土的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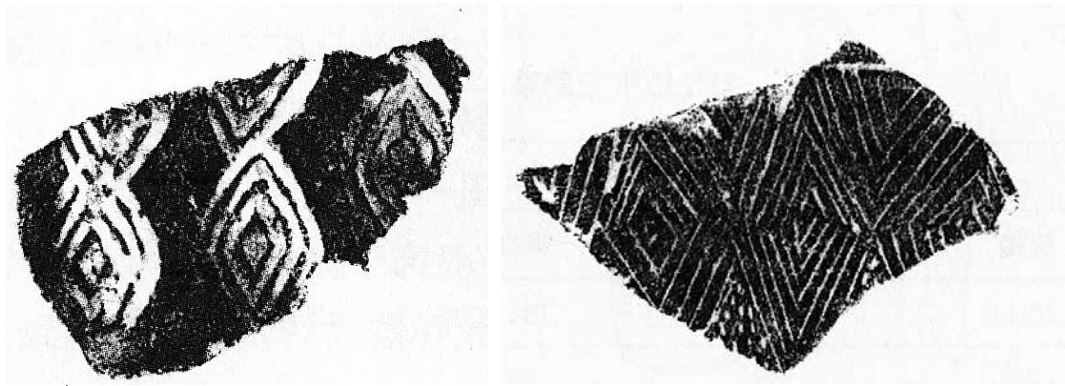


圖 14 商晚期自西周早中期 重菱紋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遺址——陽光地帶二期地點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96。

測試為銅錫鉛三元合金。¹⁵ 有研究針對金沙祭祀遺址各時期銅器進行成分檢測，結果顯示紅銅器集中出現在金沙遺址的第四期早段至第五期早段，距今 3100 年前至 2800 年前，約商末至西周中晚期，反映紅銅器在此時期的金沙遺址較為普遍。¹⁶

儘管成都僅有一例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其他的發現，如成都竹瓦街銅器窖藏，或岷江小區銅尊，極具特徵的蝸身獸紋，也能反映西周早期成都平原與關中地區存在交流。¹⁷ 〈金沙簋〉的年代極可能落在西周早期左右。整體而言，〈金沙簋〉雖然顯示關中地區（小尖乳丁式的簋）一定的影響，但僅侷限於外觀上的參考，其紋飾、製造的特徵都顯示當地特色，反映很強的自主性。

餘論

西周中期（約西元前十世紀中葉～西元前九世紀上半葉），菱格乳丁紋簋的發展在中原已邁入尾聲，數量少且菱格乳丁紋出現

簡化的現象。陝西茹家莊 1 號墓乙室出土的〈強伯簋〉（圖 15），菱格乳丁紋不見雷紋，而是以較細的重菱紋填於較粗的菱格內，乳丁紋四周可見四個小鉤，或用於暗示被省略的雷紋。相較於商晚期小鉤僅見於上下緣處，此時已擴及所有的菱格內。

〈強伯簋〉頸部的旌旗羽紋與連珠紋，反映此時期銅器興起使用商早、中期紋飾的仿古潮流。腹部的菱格乳丁紋可能如同旌羽紋與連珠紋般被視為一種古早的紋飾，側面證實菱格乳丁乳簋的消退。更者，同墓甲室中出土目前見到最早的一組列鼎列簋，至此周代禮制中極具標誌性的列器制度已見初端。可以說，從簋的發展史來看，菱格乳丁紋簋的消退恰標誌西周從早期承襲商完期風格，逐漸蛻變，最終形成周人風格這一轉折階段，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

另一方面，出於西南一隅的〈金沙簋〉，仿製時的靈活轉化及顯著地方特徵，凸顯蜀地青銅文化獨樹一格。至於重菱紋的特徵是



圖 15 | 西周中期 強伯簋 陝西寶雞茹家莊 1 號墓出土 取自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寶雞、渭濱、其他》，冊 8，圖版 896。



圖 16 春秋時期 菱格乳丁紋簋 江蘇丹陽司徒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5·東周》，冊11，圖13。

否參考當地習見的陶器紋飾，尚可討論。在此再提供另一種想法。春秋時期在中原地區菱格乳丁紋簋已然絕跡之際，江蘇出土一件菱格乳丁紋簋，由整體形制觀之，亦是具有地方風格的仿鑄器。（圖 16）該簋也出現陽線重菱格的菱格乳丁紋。兩件菱格乳丁紋簋在區域、文化及時代皆差異極大，卻有如此相似性，或許反應人類在學習、模仿時一種不謀而合的共性。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劉祥宇、周志清、王占魁，〈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銅簋〉，《文物》，2018年9期，頁33-36。
2. 王壽芝，〈陝西省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6期，頁3-9；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13。
3. 路國權，〈殷墟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年代的再認識及相關問題〉，《考古》，2001年8期，頁66-72。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49、50。
5. 張昌平、丹羽崇史、廣川守，〈論商周時期青銅簋的鑄型技術〉，《考古》，2012年10期，頁61。
6. 李永迪、岳占偉、劉煜，〈從孝民屯東南地出土陶範談對殷墟青銅器的幾點新認識〉，《考古》，2007年3期，頁59。
7. 該墓考報告尚未發表，簋資料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圖版229，頁414-415。
8. 該陶範出土於2003年孝民屯灰坑H649，資料轉引自：岳占偉、李永迪、申明清，〈試論殷墟晚期青銅禮器的兩個發展方向〉，《江漢考古》，2017年150期，圖7-5，頁94。
9. 河南75件，陝西78件，引自：任雪麗，〈商周青銅簋的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頁91。
10. 左忠誠，〈渭南縣南堡村發現三件商代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16。
11.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127-1130；張天恩，《關中商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04；李宏飛，〈論周原賀家73M1銅器群——關中地區先周時期銅器群探索之一〉，《南方文物》，2017年4期，頁118。
12. 張天恩，《關中商代文化研究》，頁286。
13. 雷興山，〈周原地區商周時期鑄銅業雜論〉，《商周青銅器的陶範鑄造技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73-182。
14.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390-392.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鎬發掘隊，〈長安灃西西周墓葬發掘記略〉，《考古》，1984年9期，頁779-783；楊軍昌、黃曉娟、韓汝玢，〈陝西關中地區出土先周及西周早期青銅器的技術研究〉，《商周青銅器的陶範鑄造技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52-161。
16. 黎海超、崔劍鋒、周志清、王毅、王占魁，〈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銅器的生產問題研究〉，《邊疆考古研究》，2019年25輯，頁337。
17. 王家祐，〈記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器〉，《文物》，1961年11期，頁28-33；李明斌、王方，〈岷江小區遺址1999年第一期發掘〉，《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82-192。

STORY • OF • AN • ARTISTIC • STYLE

風 格

故 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

The Imperial Porcelain with Painted
◆ 2020 ◆
August 18th

— 彩瓷 —

御 康 熙 製

— 珠 瑯 —

October 31st
◆ 2021 ◆
Enamels of the Kangxi Emperor

第一展覽區正館二樓二〇七陳列室

207 Gallery Exhibition Area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02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一〇二號
No. 133, Sec. 2, Zhonghua Rd., Naitou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R.O.C.)
36-464-4626/4648 <https://www.npm.gov.tw>

